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海民初字第9789号

原告中华书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法定代表人李岩，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海涛，男，该书局法律顾问，住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委托代理人于利，北京市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刘迎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钺，男，该公司职员，住该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尹小林，男，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

原告中华书局诉被告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王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华书局的委托代理人任海涛、于利，汉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钺、尹小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华书局诉称，1959年到1978年间，我书局组织百余位文史专家，投入巨大成本，主持对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以下简称二十四史）的全面系统整理并陆续出版，对点校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中华本二十四史）享有著作权。中华本二十四史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成果，成为权威范本。2005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确认我书局对中华本二十四史享有法人作品的著作权。后我书局发现由汉王公司制作发行的 516 型号的国学版汉王电子书收录了上述作品，侵犯了我书局对中华本二十四史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和获得报酬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汉王公司停止制作发行含有涉案内容的电子图书，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111.2 万元及合理费用 14280 元。

被告汉王公司辩称，涉案汉王电子书中的二十四史内容来源于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学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国内知名的专业从事古籍数字化研究开发，古籍整理与出版以及国学电子出版物研制的专业公司，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聘请顾问及与多家大学合作，多次参加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公司制作的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于 2005 年完成，其中包含由国学公司选择底本和参考版本，自行整理二十四史的点校本（以下简称国学本二十四史），获得业界的好评。《国学备览》系从《国学宝典》中精选出的常见的 280 种经史子集，以 U 盘的形式出版，2006 年进入市场销售，我公司与国学公司签约取得授权，就每本电子书中装入一套《国学备览》，向国学公司支付 50 元使用费。我公司在签约前审查了国学公司的业内资质，尽到了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支付了合理对价，该公司亦承诺对提供的内容承担责任。我公司的使用行为没有侵犯中华书局对中华本享有的著作权，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诉讼中汉王公司要求追加国学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中华书局坚持不同意追加。

经审理查明，二十四史为中国古代纪传体通史，其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清代以前各朝代的历史，共计 3249 卷。《清史稿》由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按照历代正史的体例，分纪、

志、表、传四部分共 536 卷，完稿时间为 1927 年。旧版二十四史版本较多，文字不划分段落，没有现代汉语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且因各种原因在文字上有错讹疏漏。

1958 年 4 月，文化部决定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我国古籍的出版社，出版方针和计划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导，中华书局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根据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同志指示，对二十四史展开全面系统的整理。此后，中华书局组织全国近百余位文史专家集中到中华书局工作，并由中华书局提供资料、场地和住宿，支付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人员的工资。中华书局主持制定了关于新式标点、分段、校勘的方法和体例，参与整理的人员均统一依照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对二十四史进行点校，改正错字、填补遗字、修改注释、加注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校勘记，至 1978 年整理工作全部完成。点校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之后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再版，对发现的点校失误进行更正。中华本成书分为繁体竖排版和简体横排版两种，前者自 1959 年开始陆续出版，后者于 2000 年 1 月出版，共计 63 册，两种版本均采用每卷正文后附校勘记的编排方式。《清史稿》为繁体版，1977 年 8 月出版，共 48 册。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字数共计 55 799 千字。

2005 年 8 月 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05）高民终字第 422 号天津市索易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上诉一案时，确认中华本系对相关古籍进行整理而完成，凝聚了古籍整理人员的创造性劳动，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法人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以上事实，有中华书局提交的该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繁体版和简体版图书，《清史稿》繁体版图书，以及（2005）高民终字第 442 号民事判决书在案佐证。汉王公司对此不持异议。

2009年10月21日，中华书局委托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E世界数码广场汉王公司授权的销售商北京金汉铭科技发展中心，购买四种型号的汉王电子书，均有国学本二十四史的内容，其中国学版516型号的价格为2780元。

汉王公司认可上述证据，但表示516型号的汉王电子书中只有较为特殊的国学版才包含涉案内容，该型号还有其他版本系列的产品。中华书局对此予以认可。

中华书局提交2009年8月27日《南方周末》和同年9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证实汉王公司自称汉王电子书已累计销售30万套；其同时还提交汉王公司上市的招股说明书，证实汉王电子书在2008年销售1.3万余套，收入为1872万元；2009年销售26万余套，收入约3亿元，以此证实汉王电子书的销售数量。中华书局的诉讼请求中侵权赔偿的数额系以2万套发行量为基础进行的计算。

汉王公司表示，30万套的销售数量是广告宣传，汉王电子书的型号和版本很多，其与国学公司的结算凭证可以证实，516型号国学版的销售数量为1594套。中华书局对此数量不予认可。

中华书局提交1500元公证费、1万元律师费、2780元购买产品的发票复印件，以证实其诉讼合理支出。汉王公司对此项证据不持异议。

汉王公司提交其于2008年7月与国学公司签订的两年期合作协议书及附件、产品定制需求单、费用统计情况和付费凭据，证实双方约定国学公司向汉王公司提供《国学备览》等古籍系列的电子数据，保证权属，并提供正式电子出版物版号，承诺出现侵权问题由其承担责任；汉王公司除支付基础版权费外，按照每月的销售数量向国学公司支付每套内容50元的版权费，销售数量达到一定标准后，单套费用有所降低。2009年5月至

12月，汉王公司共向国学公司支付版权使用费43.9万元。

中华书局认可上述证据，但认为汉王公司与国学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减轻或抵消汉王公司的过错，不影响汉王公司向中华书局承担侵权责任。汉王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直接承担侵权责任。

汉王公司提交国学网介绍的国学公司概况，出版、发行国学系列出版物的情况，以及国学公司出版的国学智能书库U盘实物，证实国学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营业务为古籍数字化研究开发、古籍整理出版、国学电子出版物研制、软件开发和相关网站建设等，2009年3月在三板市场挂牌。国学公司依托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班底，与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合作关系，参与《儒藏》、《中华大典》等大型古籍的整理工作，研制开发《中国古代文学史电子史料库》、《中国历代诗歌数据库》、《宋会要辑稿》、《段注说文解字》等古籍全文检索软件。其完成的《国学宝典》是全国最大的专业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收入从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传世古籍原典4000多种，总字数近10亿字，收入的文献均由该公司自己录入、校对、整理。在《国学宝典》的基础上，开发多种档次的系列电子产品，其中“国学经典文库系列”包括《国学备览》、《唐诗备览》等多种系列。国学网是国学公司的专业网站，免费向公众提供古籍内容查阅等服务。

汉王公司还提交了针对国学公司产品的社会评价情况及相关媒体报道，内容包括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中华书局内）于2007年1月对含有国学本二十四史的国学U盘智能书库出具的使用意见，称经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和部分古籍专家试用后，认为该项成果是技术信息与传统学术研究有机结合的新型科研成果，在古籍整理、传播、研究与应用中，达到一个新水平，标志着古籍电

子出版取得了新的进展。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在 2005 年同意国学公司出版 10 种相关的国学电子出版物，并附有标准版号。哈佛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收藏了《国学宝典》。含国学本二十四史的《国学经典文库》被中宣部选定在中国文明网提供给公众浏览阅读。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 2009 年第 11 期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情况简报中，收录了中华书局法定代表人李岩的文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六十年述要》，总结了建国后中国古籍整理的历史，其中在未来走向和可拓展领域的部分，针对古籍资源数字化与数字出版的整体规划，将《国学宝典》排列在几种大型数据库成果的第一位。2001 年的上述简报中，业内专家罗济平对尹小林编制的《中国典籍数据库》给予肯定；2003 年的上述简报中，中华书局编审，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华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主持人的许逸民所写《关于制作古籍数据库的几点想法》中，对国学公司总经理、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演示的《国学备览》给予高度肯定。中华书局于 2003 年出版的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功在千秋的事业》一书，整体总结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原中华书局编审，古籍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组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在其文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回顾与展望》中，对包含国学本二十四史的《国学经典文库》和《国学备览》均给予肯定。此外，汉王公司提交了荣誉证书、立项证书、聘书等证据，以证实国学公司尹小林是古籍整理和出版业内的权威专家，在古文典籍整理及数字化领域享有声誉，曾获得教育成果奖项，参与国务院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出版工作。汉王公司表示，国学公司有能力和自行主持古文点校工作，包含国学本二十四史内容的《国学宝典》等相关产品自 2005 年开始陆续上市销售，中华书局对其中内容应当知晓。

中华书局认可上述证据，认可国学公司对《国学宝典》做了大量工作，但其表示不能以国学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业内地位，证实汉王公司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中华书局表示，其在起诉前知道《国学宝典》的公开销售，也认可尹小林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能力和权威性，但上述证据仍不能证明国学公司对二十四史的内容进行了点校。

法庭询问中华书局，在发现汉王公司的电子书中有其认为侵权的内容后，是否向国学公司或者汉王公司发送要求停止侵权的通知。中华书局表示其没有看到《国学宝典》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向国学公司或者汉王公司发送过通知。

关于国学本是否构成对中华本的侵权，中华书局表示，其对古籍进行整理，划分标点，分段和校勘，与国学本的对比采用了三种方式，每种挑选十处举例说明。一是“我用你也用”，即中华本使用的标点，国学本也使用；二是“我改你也改”，即认为古籍中脱字，错字的地方，在中华本中进行了修正，并在校勘中做了记载，国学本也采用了相同的做法；三是“我错你也错”，即中华本点校存在错误的情况，被某些专家指出，国学本也发生同样错误。中华书局认为，综合以上三种情况的举例说明，可以看出双方版本的一致性。

在中华书局对上述对比情形举例的过程中，尹小林作为汉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对国学本内容的古本来源一一给予说明，并提出以下意见：

1、对古文进行点校分段，绝大部分内容的一致应属正常，中华书局的第一种方式在此并不适用。

2、中华书局提出的多处中华本改正的地方，国学公司系直接参照古本内容使用，并非照抄中华本（其表示中华书局选择的底本并非最佳，这样才能表现出其点校时发现错误的高明之处）。

3、所谓错，只是个别学者对中华本提出的个人意见，也是探讨性的学术意见，不能说就是中华本的错误，国学本的使用也属正常，这个情况区别于一般作品中认定的你错我也错的情形。

4、国学公司的点校工作系选择武英殿本做底本，以四库全书和中华点校本做参考。在古籍点校工作中，参考好的版本是惯例，是必然，已经公认是对的没有必要更正。中华书局不过是占了先机。中华本已经成为业内主流意见，后人都采用其方式，背道而驰有悖学术的发展。

中华书局认可国学本与中华本存在不同之处，但认为参考即为使用，未经许可使用即为侵权。

第二次开庭时，中华书局补充提交了《三国志》卷46《吴书》（一）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比对，举例说明其在针对各种史书底本不同的内容，将其认为正确和错误的字均写出，错的用圆括弧，正确的用方括弧标出。国学公司对正确的未加括弧，对错误用黑括弧标注。中华书局认为上述标注的方式和内容相同，只是更换了具体形式。

汉王公司表示，此种做法是古籍点校工作的常用做法，目的是尽最大可能维持古书的原貌，对任何改正都要求有说明和出处。国学本使用的字就是古书中原有的字，且使用了不同的符号。

汉王公司提交了国学公司在点校过程中形成的五大纸箱稿件，稿件的用纸黄旧，随意抽取可以看到多人多处修改评点笔迹。汉王公司表示，带来的内容并非全部，国学公司处尚有四十箱，可随时查阅，可以证实国学公司进行点校时所做的大量工作，并非抄袭中华本。

中华书局认可上述材料，但表示从材料看出，国学公司点校的基础不是完全没有标点和分段的古文，而是已经点校过的

版本，不能证明其自身进行了自始至终的点校。汉王公司表示，最初的古文版本系先由学校内古文专业的学生或研究生使用电脑进行前期标点，打印后由多名专家对照原本和参考版本逐一点校，不断修改。汉王公司认为，上述大量的材料和修改的内容证明国学公司在国学本的点校过程中参考了多位专家的意见，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华书局不认可国学公司请学生参与点校的陈述，但认可国学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认为上述工作均是在中华本基础上进行的。

汉王公司表示，国学公司做的是标点本，只是给古文加标点，没有校勘记；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与此不同，其享有权利的是校勘记，这在行业内是有区分的。中华书局表示不了解是否存在这种区分。

汉王公司进行了部分版本的对比，以证明国学本和中华本的不同，如其中部分中华本有错误的地方，国学本因最初即选择了正确的版本，故没有发生错误。尹小林在庭审时出示其给中华本内容挑出的多处错误。

中华书局认可上述错误，表示中华本繁体版中错误很多，简体本错误更多。其认可国学本确实参考使用了其他版本，但国学本系在中华本的基础上进行点校，与中华本构成实质性相似。汉王公司表示，点校本的内容整体即基本相同，参考不能认为是实质性相似。

关于中华书局的领导和编审对包含国学本二十四史内容的《国学宝典》等出版物给予肯定的意见，中华书局表示，上述领导和编审只了解国学公司有相关出版物，但并不知道其中收录了使用中华本点校的国学本二十四史。

法庭询问涉案电子书是否仍在销售，汉王公司表示，其被起诉时恰逢公司上市之前的关键时刻，其立刻停止销售，但中

华书局的诉讼仍然对其上市融资发生了较大影响。中华书局表示，其没有发现汉王公司仍有销售行为。

上述事实，还有本院的庭审笔录、质证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对中国古代历朝正史的记载，未经点校前的版本最晚完成于1927年，均已超过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保护期限。中华书局在建国后主持点校整理工作形成的中华本系对相关古籍进行整理而完成的法人作品，凝聚了古籍整理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并非简单的技巧性劳动，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本案中实际制作涉案数字图书内容的单位是国学公司，汉王公司与国学公司签约，支付费用，获得国学本内容的使用权，并在其生产销售的汉王电子书中直接复制使用上述内容。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汉王公司曾申请追加国学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但中华书局坚持不同意追加，对本案在诉讼过程中查明相关事实形成一定的阻碍，也使真正的国学本权利人国学公司不能正常参加诉讼，针对国学本内容是否侵权的问题进行抗辩，并通过其他诉讼程序维护其自身权益。

在上述情况下，本案的审理范围限定在汉王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因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和审查义务，直接向中华书局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书局在庭审中认可知晓《国学宝典》的销售，但表示对国学本二十四史的内容并不了解。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国学公司成立近十年，在国内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出版行业有相当地位，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该公司创始人和负责人尹小林是业内专家。本案涉及的国学本二十四史在国学公司自2005年开始出版陆续发行的《国学宝典》、《国学备览》等电子出版物中均有收入。古籍整理和出版行业规模有限，中华书局作为业内最大的出版机构，对国学公司及其出版物的内容应当有所了解。

此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是国家针对古籍整理出版行业设立的权威指导机构，其办公室设置在中华书局编制下，在其编制的对古籍整理出版行业进行总结和指导的情况简报，以及出版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内成就的总结性图书中，该办公室的负责人，中华书局的法定代表人，业内专家，以及曾参与中华本二十四史的编审人员等，都曾在其中评述业内成就的总结性文章中，对上述国学公司的出版物及所作的工作予以肯定，故中华书局现在以不了解其内容为名，否认其早已接触过国学本二十四史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汉王公司的营业内容为制作销售电子书，即将图书内容装入电子阅读器进行销售，其没有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行业背景，对行业特点及信息了解有限。虽然已有生效判决确认中华书局对整理后的中华本享有著作权，但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如果仅凭对二十四史的基本了解和认知，没有对古籍点校和著作权归属有进一步了解，很难判断点校本权利另有所属，该情况并非常识。且即便对中华本的权利有一定了解，国学本的内容与中华本又并不相同，内容庞杂，要求汉王公司对此作出判断超过其应当注意的范围。汉王公司在签约前对国学公司资质进行了审查，含有国学本内容的电子出版物也在市场销售多年，中华书局对此有所了解，但从未对国学公司提出权利要求，国学公司自身尚不知其国学本被中华书局认定为侵权内容，作为外行的汉王公司更不可能对此有所了解。

因此，汉王公司通过了解国学公司在业内的地位，向国学公司购买其电子出版物中内容的使用权，支付合理费用，在汉王电子书中复制使用，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审查的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且已停止销售涉案电子书，故无论国学本二十四史侵权与否，其均无需向中华书局直接承担责任。据此，本院对中华书局在本案中针对汉王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

支持。

此前多个法院包括本院，均曾对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权利予以确认，并判决使用者侵权成立，给予赔偿，但均与本案情况有所不同。上述判决中针对的使用情况均为整体复制使用，使用者及参与或未参与诉讼的内容提供者，均非古文整理和出版业内机构，没有证据证实其实际进行过点校及整理的工作，大部分还直接使用了中华本最具特色的校勘记。中华书局在本案中认可中华本与国学本存在不同之处，也认可中华本存在诸多疏漏，只是反复强调参考即为使用，使用即为侵权。

本案因国学公司未能参与诉讼，对国学本内容是否构成侵权不作认定。从行业特点来说，古文点校的工作非常特殊，点校本身包含对古文的断句、加标点、修正错误等内容，对文章的主体内容不能私自增改，稍有改变必须说明原因和注明出处；而加标点和断句又必须遵循一般语言表达的规律，所以点校的结果总体应基本一致，只在细微处存在区别，否则会产生理解歧义。对于一般性的文字作品，表达的内容基本一致或者达到一定比例，尤其含有明显的你错我也错的抄袭点，就可以认定侵权成立，但对于点校本，对比较为困难，不能使用通常的比例标准。中华书局采用的三种方法基本源于对一般性文字作品的对比，但对于古文点校作品，汉王公司根据行业特点提出的多项反驳意见亦有其合理之处。此外，古文点校本等对古籍进行整理的成果，尤其是主流成果，后人必然参照学习，这是后代学人的必然选择，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汉王公司提出证据，证明国学公司对国学本的内容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中华书局一再强调参考即为使用，即为侵权的意见，值得商榷。中华书局作为我国最大、最权威的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机构，应当对行业的规制和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和表率作用，中华本二十四史是建国后由国家指定，由中华书局集中组织全

国文史专家完成的工作，其自身亦认为是权威范本，不应禁止他人的学习和参考。参考本身如果被直接认定侵权，是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阻断。点校本著作权的认定不同于其他任何作品，如非直接复制，需要严格把握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华书局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七元，由原告中华书局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宏丞
审 判 员 杨德嘉
人民陪审员 文 龙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此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文件编号：101230-15547-209-567647

书 记 员 果 辉